

和平解放西藏综述

1951年 5月 23 日，是一个永不泯灭的日子。

下午 4 时许，中南海勤政殿，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全权代表，在庄严和睦的气氛中，在《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上签了字。一份历史文献完成法定程序正式生效，向世界宣告西藏和平解放。

举国上下一片欢腾，各族人民敲锣打鼓涌上街头，欢呼祖国大陆最后一块土地的解放，欢呼神州大地各族人民的空前大团结。

生活在封建农奴制度奴役之下，近百多年来饱受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旧中国反动统治者压迫的西藏人民，终于盼来了和平幸福的曙光。

然而，开通这条民族振兴的光明大道却非易事，它经历了非常艰难曲折的历程，经历了艰苦复杂的分裂与反分裂的斗争。障碍主要来自外国帝国主义的阴谋和西藏亲帝分裂势力的破坏。经过政治、外交和实力的反复较量，帝国主义在西藏的侵略势力被驱逐，分裂势力被挫败，人民赢得了伟大胜利。

西藏亲帝势力搞分裂

1949 年夏，人民解放战争犹如风卷残云，横扫了大江南北大片土地上的国民党反动政权，南京政府逃亡广州。就在祖国大陆即将全部解放，新中国即将诞生的时刻，在西藏高原，本世纪初帝国主义侵略者扶植起来的亲帝势力，正陶醉在“西藏独立”的迷梦之中，他们妄图趁中央政权的更换之际，把西藏从祖国分裂出去。在一系列分裂活动中，以“7·8”驱逐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西藏办事处（以下称驻藏办事处）事件最为突出。这一事件极其严重地破坏了西藏地方和中央的关系。

早在 1947 年 3 月，英国政府驻拉萨代表黎吉生（或译理查逊）一手策划，在印度新德里召开的泛亚洲会议，公然要求西藏派代表团参加这个会议。“西藏代表”带去的藏军旗帜（雪山狮子旗）被当作“西藏国旗”与其他国家的国旗一起悬挂在会场上。会议使用的地图也把西藏标志在中国疆域之外。中国驻新德里大使提出抗议，会议才更换了地图，摘下了藏军旗帜。帝国主义和西藏分裂势力相勾结制造的这一西藏独立的闹剧虽然被迫收场，但西藏代表被邀请出席会议却给西藏分裂势力以蛊惑，促使他们进一步铤而走险。

1947 年末，西藏派出一个以孜本夏格巴·旺秋德丹（以下称夏格巴）为首的“西藏商务代表团”，到印度、英国、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表明西藏的独立和主权地位”。该代表团在旧金山、华盛顿向新闻界大肆鼓吹“西藏独立”，要美国承认西藏是“独立国”。但是，美英两国为了自身的利益，在接待“西藏商务代表团”时耍了一个花招，一方面对代表团的

分裂主义立场给予鼓励和支持；另一方面，为了不招致政治上的麻烦，两国都没有把该代表团当作一个政治实体的官方代表团对待。因此，这一阴谋活动未能得逞。

1949年，在黎吉生策动下，摄政达扎·阿旺松热（以下称达扎）召集了一个15名官员参加的“机要会议”，炮制出又一个危险阴谋——“7·8”事件。

7月8日，西藏当局通过印度噶伦堡电台，通知国民政府“为防止赤化的必要措施，决定请彼等（驻藏办事处）及其眷属立即准备离藏内返”。

同一天，达扎指派首席噶伦然巴·土登贡庆（以下称然巴）等出面，把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主任秘书、代处长陈锡章招至噶厦。然巴说：“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内战甚烈。国民党军队和官员走到哪里，共产党就追到哪里”，“为西藏佛法圣地长治久安……检出可疑之共产党秘密工作人员，不使彼等任何一人乔装寄迹于西藏”，“西藏大会决定要对国民政府暂时断绝政治关系”，要驻藏办事处人员即刻离开西藏。随即，噶厦指派仲译钦波曲培土登等人指挥驻拉萨藏军，包围国民党政府驻藏办事处，没收电台，关闭拉萨小学，占领测候所。于是，国民党政府驻藏办事处人员和家属以及所谓的嫌疑人员100多人，于7月11日、17日、20日分三批被武装押送至中印边境，经印度海路遣返内地。

这一分裂祖国的严重政治事件，是西藏分裂势力勾结帝国主义和外国反动派精心策划的。他们的目的，就是乘国民党政权处于自身难保无力管理藏事而人民解放军尚未到达西藏的时机，断绝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摆脱中央对西藏行使主权，阻止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使西藏不能得到解放，从而把西藏从中国领土中分裂出去。这也是外国反

动势力特别是美帝国主义，从它们的扩张主义政策和遏制共产主义全球战略出发采取的重要步骤。

其时已逃至广州的国民党政府面临崩溃，但对“7·8”事件也作出了强烈反应，于7月19日召开行政院80次会议作出“以院长名义复电西藏噶厦”等四项决议。行政院院长阎锡山在给噶厦的复电中说：“此次噶厦，既无事实根据，复未来电呈报，片面通知各驻藏人员全体撤退，于法于理殊多未合。”

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分别于9月2日和7日发表社论和署名文章，揭露“7·8”事件的实质，表示了严正态度。新华社社论指出：7月8日西藏地方当权者驱逐汉族人民及国民党驻藏人员的事件，是在英美帝国主义及外国反动派策划下发动的。英、美、印反动派勾结西藏地方反动当局举行“反共”事件的目的，就是企图在人民解放军即将解放全国的时候，使西藏人民不但不能得到解放，而且进一步丧失独立自由，变为外国殖民地奴隶。社论指出，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定要解放西藏。

“7·8”事件发生后，英国、美国和印度的报刊，立即为西藏分裂祖国的活动叫好，对中国发出恐吓。英国电讯说：“英国从未承认中国所说的西藏是中国一部分，并受中国统辖的讲法”，“英国可能出面干涉”。美国合众国际社说：西藏“可能完全脱离中国名义上的宗主权。”印度新闻社则称：“西藏从未承认中国的宗主权”。

就在被驱逐的国民党政府驻藏办事处人员还在返回内地的途中，8月份，美国便派出劳尔·汤姆斯（或译托马斯）父子二人，以“广播公司评论员”名义进入西藏，同摄政达扎进行密谈，并转递了美国杜鲁门总统、艾奇逊国务卿的信件。

汤姆斯在拉萨停留的一个多星期中，积极鼓励西藏当局成立一支有技术的游击队，接受技术训练，准备破坏交通补给线，阻止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汤姆斯于 10 月返回美国，在机场举行新闻发布会，要求美国提供给西藏反对中国共产党的援助，指导西藏人的游击战争。

“7·8”事件，国民党政府驻藏办事处被驱逐，西藏亲帝势力分裂祖国的活动愈演愈烈。

“7·8”事件后不到三个月，于 1949 年藏历九月十二日，西藏“外交局”居然致电毛泽东主席，狂妄宣称：西藏是“一直享有独立自主权利”的国家，“请不要将军队（指人民解放军）越境进入西藏领土”。

更有甚者，于 1949 年 9 月 17 日，拉萨召开的官员会议，作出了从军事、政治等各方面全面对抗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的决议。官员会议在上报摄政达扎的呈文中说：“共产党的主张、行为和政教合一的西藏的习惯、观念，如同水与火完全不能相容。无疑，没有比共产党的威胁更严重的危险了。因此，不得不作出相应的文武对策，以保护政教安全永存”。

所谓的文武对策主要包括：

——扩充藏军、组织民兵，进行军事技术训练，征集调运军需物资。

——向美国谋求反对共产党的援助，同印度签订新约，遏制共产党西进。

——对百姓进行广泛的反共宣传、教育。

同“7·8”事件一样，这次官员会议也是西藏亲帝分裂势力和帝国主义者勾结的产物。会议呈文中公开承认外国人参与了会议的筹划活动。呈文说：这次会议是根据“报务员

福克斯、水利土建工程正副指挥德国人（哈雷、奥夫斯内特）”等方面提供的对国共两党战争形势的分析而召开的。

西藏当局的倒行逆施，受到举国上下严正的谴责，全国各族人民强烈要求早日解放西藏。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朱德总司令命令人民解放军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国土。

就在新中国成立的当天，长期羁留在青海的十世班禅额尔德尼致电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表示拥护中央人民政府，希望早日解放西藏。电文说：“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凡有血气，同声鼓舞。今后人民康乐可期，国家之复兴有望。西藏解放，指日可待”。

11月23日，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复电班禅大师，对他的愿望给予了肯定答复。电报说，西藏人民是热爱祖国而反对外国侵略的，他们不满意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策，而愿意成为统一的富强的各民族平等合作的新中国大家庭的一分子。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必能满足西藏人民的这个愿望。

一些在京的藏族人士和藏族青年知识分子集会，斥责拉萨当局的叛国行为，表达藏族人民要求解放西藏的愿望。桑吉悦希（又名天宝）发表讲话指出，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任何反动派阴谋侵略、出卖西藏，都将遭到西藏人民的反对而彻底失败。

1月26日，藏族农牧民、青年、妇女和民主人士代表百余人，在刚刚解放的兰州集会要求解放西藏。一位藏族妇女发言说：“藏族和汉族、回族等民族，犹如手的五指不能分割开。我站在藏族妇女的立场上，请求解放军早日解放西藏”。

早年从西藏逃亡内地的热振活佛的苏本益西楚臣，从塔

尔寺到西宁找到解放军首长，恳请解放军早日进军西藏，搭救受苦受难的西藏同胞，并主动要求担任藏语广播员，通过电波宣传人民政府的民族政策，呼吁藏族同胞迎接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

当年红军长征经过甘孜时，和红军结下兄弟情谊的格达活佛和夏格刀登、邦达多吉等西康省藏族爱国人士，派代表前往北京向毛主席、朱总司令致敬。他们的代表汪嘉说，藏族同胞将同当年“博巴”政府支援红军北上抗日那样，以一切人力、物力，支援解放军解放西藏。

中央制定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决策

1949年夏，当人民解放战争还在许多战场进行的时候，毛泽东主席已经在为解放西藏作必要的准备。8月6日，毛泽东主席致电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指示在解放兰州和大西北的战斗中，对驻锡青海塔尔寺的班禅额尔德尼，要“十分注意保护，并尊重班禅及甘青境内的西藏人，以为解决西藏问题的准备”。

当时，班禅已在战争动乱中离开塔尔寺移居青海西部的一个小镇——香日德。彭德怀即派中央军委情报部青海联络站的余凯和青海省委统战部战部长周仁山到塔尔寺作班禅堪布会议厅的工作，又动员塔尔寺和甘南拉卜楞寺活佛前往香日德迎请班禅返回塔尔寺。

10月，人民解放军向华南、西南大进军。毛泽东主席在10月13日的一份电报中，就为解放云、贵、川、康及西藏的五省区作了部署，决定调十八兵团入川。电报中说：“经营云贵川康及西藏的兵力为二野全军及十八兵团，共约60万人。”

并宣布中共中央西南局的分工是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分任第一第二第三书记，贺为西南军区司令员，邓为政治委员，刘为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

以后，毛泽东主席考虑到西北结束战争较西南为早，于是又考虑以第一野战军为主力，由青海入藏。11月23日，毛主席致电彭德怀并告贺龙、习仲勋、刘伯承，电报说，请西北局讨论一次经营西藏问题。就现在情况看，应责成西北局担负主要责任。电报指出：解决西藏问题不出兵是不可能的，出兵当然不止由西北一路，还要有西南一路。故西南局在川康平定后，即应着手经营西藏。12月30日，彭德怀致电中央并毛主席，详细报告了由新疆、青海入藏的道路和气候情况，提出西北入藏困难甚大，宜由西南入藏的建议。

1950年1月2日，毛主席正在苏联访问，又从莫斯科致电中央、彭德怀并转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对解决西藏问题又作出部署。电报说：“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进军，既有很大困难，则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担负”。电报要求西南局确定入藏的部队及领导经营西藏的负责干部，并对西南局组织进军西藏的各项准备工作，提出了具体意见。西南局和第二野战军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迅速作出部署，确定以第十八军为进藏主力。1月24日，经中央批准，组成以张国华为书记，谭冠三为副书记，王其梅、昌炳桂、陈明义、刘振国、天宝为委员的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负责统一筹划进军西藏和经营西藏工作。

与此同时，中央同意刘伯承、邓小平提出的以十八军为入藏主力，并由青海、云南、新疆多路向心进兵的建议，并分别下达了命令。

1949年末，成都战役胜利结束。参战的第十八军指战员

于1月上旬正回师川南，突然接到原地待命的通知。要军长张国华率领各师主要领导干部赴重庆野战军首长，接受新的任务。

1950年1月10日，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在重庆接见十八军张国华军长，接着又于15日接见十八军师以上主要领导干部，传达党中央、毛主席解放西藏的决策、方针和部署。刘伯承司令员说，解放西藏完成祖国大陆统一，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巩固西南边防，解放西藏人民，是我党光荣而艰巨的事业。希望你们勇敢地担当起来。邓小平政委说，西藏是少数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均有特殊性，政策性很强。解放西藏有军事问题，也有政治问题，但军事与政治比较，政治是主要的，要军事政治协同解决。政策问题极为重要，要靠政策走路，要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团结达赖、班禅两个集团。接受与完成党所给予的最艰苦的任务，是每个共产党员、每个革命军人的无上光荣。

十八军来自豫、皖、苏地区，转战安徽、江西、湖南、贵州，带着满身征尘来到天府之国四川。原来任务是驻守川南。张国华军长已出任川南行署主任，谭冠三政委即将到自贡市任市委书记，多数干部也都被任命了地方工作职务。多年戎马生涯眼看就要成为历史，整个部队都有一种稳定下来，在天府之国安家，歇口气的愿望。突然，新的任务来了——向遥远的、神秘的、陌生的西藏进军。这个弯转得很急，一部分指战员一下子难以适应新的情况。军党委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在全军进行声势浩大的进军西藏动员活动。全军立即学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和新华社1950年元旦社论，使广大指战员明确解放西藏是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神圣职责，总结渡

江以来的进军工作，评选功臣模范，作进藏的思想酝酿。各级党组织召开党的扩大会，活动分子会，进行自上而下的层层动员。军师主要领导干部深入基层，作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并进行党支部整顿，发挥基层党组织作用。经过深入动员，大大提高了对解放西藏伟大意义的认识，激发了指战员的革命热情。

在进军西藏的誓师大会上，谭冠三政委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作政治动员。他越讲越激动，突然举起右手，把头上的军帽一把抓在手里，在千万战士的面前，极其郑重庄严地说道：“你们记住！此去边疆，如果我为祖国献身了，请一定把我埋在西藏。”最后，他带领指战员们振臂高呼：“定把五星红旗插上喜马拉雅山！”

为适应高原长途行军跋涉，部队迅速掀起行军、生活高原化的训练，战士们在川西平原上搭起帐篷生活，开展长途负重行军锻炼。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和十八军党委立即成立了“政策研究室”，吸收一批懂得藏语文、熟悉西藏情况的教授、专家，调查西藏情况，提出具体政策执行意见，供教育指战员用。

3月下旬，十八军成立了由副政委王其梅、第二参谋长李觉等人组成的前进指挥所，同时派出了南北两路先遣部队。前进指挥所于4月底进抵西康省的康定。北路先遣部队由五十二师师长吴忠和天宝率领该师一五四团，取道雅安、康定、道孚、炉霍，4月28日到达甘孜。天宝是西康藏族，1935年红军长征经过西康，他参军北上。他熟悉西康藏族情况和藏族的历史、民风、民俗，对开展藏区工作起到了很大作用。5月初，一五四团政委杨军率二营进驻金沙江东岸的邓柯。南路先遣部队由五十三师副政委苗丕一率领该师一五七团一部，

取道康定、雅江、理塘，于 7 月 30 日进抵金沙江边的巴塘。在这之前，巴塘我地下党负责人平措旺阶和十八军敌工部长陈竞波率领先遣支队和一批当地吸收的藏族青年于 6 月底先期到达巴塘。

先遣部队的主要任务是对康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兵志等情况进行调查研究，为制定政策提供依据；开展对藏族上层的统一战线工作，和藏族人民广泛接触，宣传我党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政策，取得当地上层人士和藏族群众对我军进军西藏的支持。

当时的西康，有很多有实力的土司和上层人物，如德格的降央伯姆、玉隆的夏格刀登、义敦的邦达家族。做好这些人的工作，对于团结西康大小土司、头人十分重要。为团结这批关键人物，先遣部队领导分工负责做好夏格刀登等人的工作；他们亲自登门拜访，和上层统战朋友交心，向上层人士讲解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宣传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争取他们赞助和支持进军西藏。

十八军接受进藏任务后及进军途中陆续吸收了一批藏族青年参军，主要有北京藏文班的学员和巴塘的藏族青年学生。这批藏族青年，在以后的进军西藏和建设西藏的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毛泽东主席从西藏的经济、政治状况出发，体恤藏族人民的疾苦，规定了“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方针，进藏部队的费用由中央包干，所需物资主要由内地运送。

在这一方针指导下，向山川阻隔、交通闭塞的西藏高原进军，后勤供应成了至为关键的问题。朱德总司令曾致函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就进军西藏的供应问题作了重要指示。西南局、西南军区把组织支援进藏，作为首要任务，要求做到

“前方部队需要什么就供应什么”。刘伯承、贺龙，亲自策划指挥支援工作。

1950年2月初，西南军区组成以十八军副军长昌炳桂为司令员、第三兵团后勤部长胥光义为政委的支援司令部，负责组织实施支援进军的各项工作。在川西地区迅速征集大批粮食，在全国各地采购了包括皮衣、帐篷、防潮雨布、固体燃料等各类高原行军特需物资。国家还特地铸造银圆，拨发黄金，为部队入藏后购物之需。

为把物资运往前方，从4月13日起，抢修雅安至甘孜段公路。抗日战争后期，国民党政府曾修筑一条雅安至甘孜段公路，因坡陡路窄，未能通车，早已废弃。西南军区抽调六个工兵团，并十八军三个团和两个营，投入这段603公里路段修复工程。修路部队发扬“吃大苦，耐大劳”的精神，克服高山缺氧、施工条件极差的困难，奋战四个半月，打通了海拔3600多米的二郎山和海拔4200多米的折多山，于8月26日通车甘孜。

高原运输既艰难又壮观。由853辆汽车、3381匹骡马组成的运输大军，在川康线接力运输。大渡河两岸公路已通而大桥未架好，运输兵就把汽车拆卸装船送到对岸，再组装起来运输；飞仙关等八座大桥被洪水冲毁，运输英雄们便用溜索、牛皮船转运物资过河。当年唱遍全国的《歌唱二郎山》、《英雄们战胜大渡河》赞歌，就诞生在高原筑路、运输英雄们中间。汽车和牲畜接力运输，全年共运输物资37700多吨，为部队提供了后勤保障。

全国各地，特别是邻近西藏的四川、西康、云南、青海、新疆等省区，均以人力、物力支援进军西藏。重庆的代食粉、京津的蛋黄腊，东北的皮衣、上海的雨衣、武汉的固体燃料，

源源运到进藏部队战士手中。新解放的西康藏族地区，由土司、头人和寺庙上层人士参加的运输支援委员会，动员了大批牲畜驮运物资。在漫长的高原运输线上，有 10 万以上牦牛参加经常性的运输。仅德格、白玉、石渠、邓柯四个县，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就出动牦牛 6 万多头 驮运物资 26 万多驮。所有参加运输的民间牲畜，都按当地市价付给了运费。德格女运输队员曲美巴珍，用自己的两头牦牛和一匹马，在 120 公里的运输段上，驮运物资 100 多次。遇到雨天，她脱下自己的衣服盖住粮食驮子，被誉为支前模范。这样感人的事迹，在风雪高原运输线上随时都能看到。

与此同时，新疆独立骑兵师和一个骆驼团，在 1800 名民工的支援下，从 5 月起，自于田经普洛修建入藏公路，至年底完成 208 公里路段。青海方面，一军部队从 5 月中旬起开始修建西宁至黄河沿公路，至 11 月底修通 277 公里。

十八军在接受进藏任务之后，普遍深入地进行了民族政策、统一战线政策和西藏的民风、民俗学习，并制定了以民族政策为主要内容的《进军守则》。部队进入藏族地区，便把模范执行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尊重藏族人民风俗习惯，当成重要准则严格遵守。公平交易、说话和气、不住民房、不进寺庙、不征用民力、不乱借群众之用具。他们的一举一动，正像邓小平同志当时指示的那样：“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

进驻甘孜的部队，带来的干粮吃完了。战士们挖野菜、捕捉麻雀和地老鼠充饥。地老鼠是草原一害，捉来当餐饭，既为草原除害，又能救急。但是，有人却说这是“杀生”。部队听了，为尊重藏族人民风俗习惯，肚子再饿，也坚决下令停止捕捉。

新疆骑兵独立师先遣连，在团保卫股长李狄三率领下，于8月1日从新疆于田县出发，翻越苍莽昆仑，穿过荒漠无人区，9月进驻阿里地区的扎麻芒布（即廷空，该地草木较好，连队称之为扎麻芒布，意为刺柴很多）。他们一支起帐篷，便先后派出六个小组，分赴四方寻找群众和官员联络，很快同当地藏胞和官员交上了朋友。他们向藏族同胞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把他们历经千辛万苦从遥远新疆带来的粮食、衣服、茶叶等物品用来救济贫苦牧民。

李狄三和当地官员之间有过多次友好信函来往。保存在原西藏地方政府档案库里的历史资料，反映了这支英雄连队所经受的严峻考验和模范执行民族政策的感人事迹。

噶厦驻阿里的行政官员噶本在写给噶厦的一份报告中称：“从廷空到噶尔下了一场大雪。共产党的驻地廷空、多莫、纳惹、玉瓦加巴等四处，被前所未有的大雪围困，帐篷之间无法通行，勉强通行就会发生危险。当前部队首长李狄三和士兵，都患了水肿和肺炎。从新疆带来的马匹，由于长途跋涉，加上大雪，缺少饲草，大量死亡，少数剩下的也十分瘦弱不能使役”。

连队严格执行民族政策，但有时难免发生事故，而正确处理事故，更体现了党的政策。李狄三在给阿里噶本赤门巴、马朗巴的一封信中，通报了他对两起事故的处理情况，信中说：“连队在打猎时，误伤牧民两头牦牛，已对肇事者进行处理，并赔偿牛主才典和才仁两人大洋50元、玉米300斤、面粉100斤、砖茶三块以及花布若干”。赔偿远远超过牦牛的市价，这哪里是赔偿，分明是子弟兵献给藏族人民的一片诚心。

艰苦环境、长期劳累和严重营养不良，李狄三终于病倒了。卫生员给他打针，他摇摇头，吃力地说：“不要浪费！给

新病号留下！”李狄三弥留之际，译电员给他念了后续部队即将到达的电报，他的眼睛闪出亮光，他要和死神抗争到新战友到来。当后续部队首长安志明来到他的身边，流着热泪大声呼唤着李狄三的名字时，他脸上露出笑容，心脏停止了跳动。这个 135 人的英雄连队，在同大风雪搏斗的二百多个日日夜夜里，就有 56 人被饥饿、严寒、疾病夺去了生命。

进藏部队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打破语言障碍，消除民族隔阂，澄清迷雾般的谣言，取得了藏族同胞的爱戴和信任。藏胞把人民解放军同赵尔丰的清军和藏军作比较，得出一个非常简洁而明晰的结论——人民解放军是“嘉沙巴（新汉人）”。

中央在确定人民解放军向西藏进军的同时，就确定了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1950 年 1 月 20 日，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发言人就西藏问题发表谈话，即明确表示：如果西藏当局“派代表到京谈判西藏的和平解放问题，那么，这样的代表自将受到接待”。1950 年 2 月 25 日，中央发出指示：“我军进驻西藏的计划是坚定不移的，但可采取一切办法与达赖集团进行谈判，使达赖留在西藏与我和解”。这就是说在人民解放军进军的前提下，努力争取通过和平谈判方式解决西藏问题。

进藏先遣部队一进驻西康藏区和金沙江畔，便向西藏当局开展政治争取工作。部队通过康定、甘孜、巴塘等地的上层人士和来往于金沙江两岸的商旅，将中央争取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以及党的民族、宗教政策，以各种方式传给西藏当局和昌都总管拉鲁·次旺多吉（以下称拉鲁）以及驻守金沙江沿岸的藏军代本。吴忠和天宝在给拉鲁总管、牟霞代本的信中说：西藏地处边陲，近百年来为帝国主义欺凌，造成人民生活极大痛苦。本军希望与藏胞亲密携手，共谋解放，望阁

下转报达赖活佛，即派员来甘孜前线指挥部就有关进军西藏之各项具体问题，详作洽商。

为达到和平解放西藏的目的，中央多次批准派遣熟悉西藏情况，对西藏有一定影响力的人士入藏，同西藏当局直接对话，宣传中央的和平主张，劝其响应中央号召，不动干戈，实现祖国统一。

1950年2月25日中央批复西南局同意“派志清法师赴藏说服达赖集团脱离美英帝国主义回到祖国，要达赖本人或其他代表赴北京协商解决西藏问题办法，或在进军中与我前线司令部谈判”。电报中还说：“西北方面如有适当之人能派到拉萨去进行说服达赖集团者，应设法派去”。

志清法师早年曾到拉萨哲蚌寺学经。1943年至1944年间，经拉萨传召大会辩经，获得拉让巴格西学位。在藏期间，他广为交游，结识不少上层人士，拉鲁、擦绒·达桑扎堆和宇妥·扎西顿珠等都是他的朋友。志清法师一行来到金沙江畔，要过江却不能，藏军设防甚严，被阻隔在金沙江东岸，直到昌都战役后才随军进入拉萨。

5月3日，在中央和西北局指示下，青海省人民政府派出以达赖长兄塔尔寺的当才活佛为团长，黄南州的夏日仓活佛、大通县的先灵活佛为副团长的青海省寺院劝和团进藏，劝说达赖集团派代表到西康与人民解放军进行和平谈判。该团行前，西北军政委员会彭德怀主席亲自到西宁接见劝和团全体成员。

7月，劝和团行至藏北那曲，为西藏当局扣留。三位活佛被送往拉萨，电台被没收，夏日仓、先灵活佛遭软禁。唯独当才活佛受到优待，与达赖会面后，前往亚东出走国外。劝和团秘书迟玉锐夫妇等被藏军押到山南泽当囚禁，直到1951

年 2 月才被释放，归还了电台。

青海劝和团出发后的第六天，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著名藏族学者喜饶嘉措在西安人民广播电台对达赖、摄政和西藏僧俗各界发表广播讲话，指出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解放西藏的各路解放军即将出发，告诫僧俗人民不要听信英、美帝国主义侵略者挑拨离间，敦促西藏当局派遣代表赴京进行和平谈判。

西康解放后，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的甘孜白利寺格达活佛带领随行人员，于 1950 年 7 月 10 日离开白利寺前往拉萨劝和。格达活佛是一位有名的爱国活佛，早在中国工农红军路过甘孜时，格达活佛就结识了朱德总司令和刘伯承参谋长，并担任当时在甘孜建立的“博巴苏维埃政府”副主席，积极支援红军。红军北上抗日后，他又掩护、转移红军伤病员。在以后的中华民族多难的年代，他翘首盼望红军归来。

关于格达活佛劝和情况，五十二师师长吴忠回忆说：先遣部队进驻甘孜后，我和天宝同志到白利寺拜访格达活佛。落座后，格达活佛拿出一张珍藏多年的朱德总司令照片和 1936 年由中国抗日红军总司令部总司令陈昌浩签署的保护白利寺的布告，他触景生情，畅谈当年和红军相处的美好日子，怀念那段愉快生活。当话题转到西藏解放问题上时，格达活佛更是激情满怀，他说，西藏上层人物中他有不少熟人。他经过反复考虑，决心去拉萨宣传解释中央的主张，希望我们向朱总司令报告，批准他的要求。他言词恳切，决心已定。我们向西南局和中央报告了他的请求。不久收到朱总司令复电，对格达活佛的爱国热忱深表嘉许，中央并邀请他作为特邀代表参加 6 月中旬召开的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格达活佛看